

浦东开发开放五步走

■ 本报记者 王曼 实习生 马晓玥

“浦东的开发开放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为中国改革开放打造了样板、树立了标杆。”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近日举办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这样说道。

上海作为沿海港口城市,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连接着中国与世界的的需求,是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的关键节点,因此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有5个全国倒数第一”,面临着人口密度大、城市发展空间不足等问题,浦东开发开放成为解决这个问题

的关键。开发开放30余年,浦东发生了沧桑巨变,以全国1/8000的面积创造了全国1/80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中国经济奇迹最亮眼的名片之一。2021年,浦东新区GDP高达15353亿元,占上海全市的35.53%。

粤港澳大湾区开放重在率先推进规则衔接

■ 余宗良

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主要是属于经济规则衔接,包含法律、税收、贸易、投资、金融、数字等多个领域的规则衔接,也涉及社会规则衔接。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以来,联动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建设,以横琴、前海双合作区和南沙为引领、示范,以及协同湾区各大平台,不断推进规则衔接,如在“湾区通”工程推进过程中,不断促进交通、通讯资费、信用信息、电子支付等领域标准互认、规则衔接;在金融服务、科技创新、通关监管、贸易规则、公共服务等方面也加强对接。

一、不断深入认识粤港澳规则衔接对大湾区建设的意义

分工、专业化程度和市场规模相辅相成、循环累积,其中的堵点或壁垒需要不断打通。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国民经济畅通循环关键要打通制度堵点,推进要素便利流动和优化配置,经济方能增长。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推动建设,分属不同关税区域、不同法律体系、不同货币制度,存在制度的鸿沟或堵点壁垒,相应影响了要素的便利流动,以及市场规模、分工和专业化程度。

同时,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经贸体系进入深度调整期,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经贸协定正加速国际经贸规则调整进程。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推进制度型开放,必将在新一轮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开放先行区,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率先推进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则是重中之重。

二、大湾区建设应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目前,中国已申请加入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体系,意味着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战略与深入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密切协同推进,叠加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基因以及制度型开放的巨大场景、利益诉求。这意味着,大湾区开放的制度需求需要不断从新一轮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中去获得制度供给。

鉴此,大湾区亟待率先对标CPTPP等新一轮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制度创新。一是在贸易领域加快货物贸易便利化、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建立健全大湾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二是在投资领域优化投资准入规则、强化投资监管制度、完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三是在产业领域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加快数字规则接轨、推进生物医药制度改革;四是在科创领域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强化知识产权规则对接;五是在竞争与环境领域完善竞争相关法律法规与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对接国际环境、社会及治理标准。

同时,发挥好局部试点作用,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区等三大引领性平台,协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东莞滨海湾、中山翠亨、南海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业合作区、江门银湖湾和大海湾等湾区特色平台,以及湾区各大功能区,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有所侧重、确保风险可控,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分别在民商事、跨境服务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方面率先推进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度对接,局部突破,以点带面,撬动全局。

三、大湾区建设应加强粤港澳三地机制对接

“机制”主要是指运行机制及策略安排。机制对接的选择和参与主体以及问题、目标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参与主体受不同的条件约束,对应着不同的运行机制及策略安排。由于粤港澳三地之间存在不同法律体系、治理结构和利益诉求,相应三地存在政府运作机制差异、市场运作差异、社会运作差异。因此,三地规则衔接也需要机制对接做支撑,并且需要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粤港澳三地协同。一是完善各级政府机制对接体系,统筹中央与港澳跨层协调机制,建立三地政府分类对接体制机制,内地借鉴香港有限政府建设的优秀经验,港澳借鉴内地有为有效政府建设的优秀经验;二是建立大湾区统一市场机制,建立统一标准体系,制定大湾区版“负面清单”制度,推进大湾区市场监管机制对接;三是创新社会机制对接新模式,打造三地社会治理统一协调机制,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快三地社会机制协同,加强三地行业协会合作等。(作者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自贸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周汉民从“立法先行”“创业时代”“见证时代”“历史新阶段”“自贸区时代”五个方面,对浦东30多年筚路蓝缕的蝶变过程作了重要解读。

一是立法先行。1990年4月30日,在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浦东开发开放决定的12天后,上海宣布了浦东开发开放十条优惠政策。周汉民认为,今天看当初的每条优惠政策,都是浦东发展的坚实基础。

“我们的立法使用三种文字公布,中文、英文、日文,而且同一天公布。”周汉民说,1990年9月,浦东开发首批九部法律以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向世界公布。

二是创业时代。当时,开发开放浦东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缺乏资金。1993年,浦东在全国率先尝试“土地批租、滚动开发”的创新开发模式,这一创新土地开发模式实现了浦东新区以地集股、以地融

资、以地招商、以地抵押、全方位土地批租,开辟了新区开发的新路径,为整个浦东的开发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是见证时代。1992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同志对上海提出殷切期望:“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东方明珠自1991年开始建设,1994年正式建成。随后,金茂大厦、浦东国际机场等浦东地标相继建成。2000年8月,浦东新区政府成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新体制诞生。

四是历史新阶段。2000年3月,上海申博办正式在上海新虹桥大厦成立。时任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的周汉民暂时放下了浦东新区的管理工作,作为申博办的副主任和中国驻国际展览局代表,长期待在法国巴黎做推广和游说的工作。2001年,上海经历了有史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世博会申办。在上海世博会举办12年后,昔日的世博园浦东片区已变成央企总部基



荒漠中有序推动埃及超高压设备建设

■ 沈小晓

在埃及苏伊士省靠近红海的一片荒漠中,中国企业承建的埃克萨迪亚500千伏变电站项目已经初具规模。中埃两国建设者正进行最后阶段的设备安装和调试,保障项目如期投产。

上午10时,埃及工程师穆罕默德·德拉尔和中方技术人员周鹏飞一起,对变压器蝶阀和散热片的安装情况进行检查和验收。“500千伏变压器采用强油风冷式循环散热,必须确保散热系统运行良好。一旦出现问题,在自身产热和室外高温下可能导致事故。”德拉尔说。

该项目由中国西电集团子公司西安西电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电国际”)以联合体形式总承包,是该区域重要电力基础设施项目,也是埃及国家电网主干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涵盖了从22千伏到500千伏的埃及主要输电网络全部电压等级,变电站中的14台

变压器、57个间隔的高压开关及户外设备,全部由中企生产。目前,变电站各项建设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内完工。

近年来,埃及计划将苏伊士运河发展轴打造为中东和非洲区域最大的贸易中心,将有大批企业搬入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同时,埃及新行政首都基础设施建设也对苏伊士运河经济区产生大量电力需求。由于埃及本土企业还不具备生产超高压设备的能力,区域电力供应面临严峻挑战。

西电国际埃及分公司副总经理张鹏博介绍,埃克萨迪亚500千伏变电站建好之后,将通过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连接埃及新行政首都、苏赫奈泉发电厂,以及该区域重要工业用户和周围城镇。“项目将优化该地区电网结构,提高供电网络运行安全性和可靠性,极大改善当地用电紧张状态,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支持。”张鹏博说。

沙漠空气稀薄,遇上沙尘暴天气,漫天遍地都是沙土。恶劣的外部环境对变电站中的变压器和高压开关等主要设备安装和维护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如果在安装过程中对设备清洁与维护管理不到位,很容易引起设备运行故障。”张鹏博介绍,为减少沙漠环境对设备安装的影响,安装团队积极改善安装环境,“比如设备安装厂房的门窗采用隔板、塑料布封闭,有效减少风沙;工作人员进出需要除尘,避免沙尘进入厂房内。”

今年31岁的德拉尔一直从事电力设备安装工作,去年来到变电站参与变压器安装。他表示:“参加这里的工作,我不仅掌握了500千伏变压器的安装工序,还从中国师傅那里学到了严谨的工作态度,对个人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很

有帮助。”德拉尔说,由于供电系统仍不完善,埃及停电现象时有发生,“期待埃中两国在电力领域扩大合作,促进埃及电力系统的发展和升级”。

截至目前,中国西电集团下属的西电国际、西电-EGEMAC公司已在埃及市场参与并完成数十个变电站成套工程项目,为20多个变电站提供了66千伏至500千伏电力变压器、避雷器等输变电设备,提升了埃及本土电气设备生产能力,促进当地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埃及国家电力与可再生能源部新闻发言人阿依曼·哈姆扎表示,埃及在电力生产、分配、传输和服务等领域与中国有着全面的合作,埃及将派技术人员到中国学习技术经验,并鼓励本地电力公司与中国企业合作。“期待埃中保持良好的合作势头,促进双方取得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哈姆扎说。

人才和营销:中国企业提升软实力需双管齐下

■ 本报记者 张凡

“无论国外环境如何变化,都阻挡不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步伐。现在可以看到,除了科技互联网、新能源等行业的出海意愿依然不减,近几年涌现出的智能制造、智能穿戴、智能汽车等新兴行业,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势力。”领英全球副总裁、领英中国总裁陆坚在7月6日举办的“第二届加速提升中国企业国际软实力论坛”上致辞时表示,领英愿意携手合作伙伴,在各地政策环境、当地文化与价值观、ESG企业社会责任等软性的能力建设方面为企业出海赋能。

随后,领英相关负责人在“扬帆出海正当时——领英助力中企出海”主题媒体沟通会上分享了中国企业出海的痛点与误区,以及中企如何在人才和营销两方面发力,助力中企出海行稳致远。领英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整体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加速了其在东道国的本地化进程,正处于从“走出去”向“走进来”跨越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出海的重要关口,中国企业也遇到更多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具备全球化视野,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另一方面还需要本地化运营,充分了解该区域的文化和价值观,明晰当地市

场的特性,吸引当地人才。

人才是衡量一家企业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越来越多的国内AI等高科技、智能制造企业布局海外的研发中心,愿意用高薪聘请技术实力强、管理经验丰富的海外人才,提升自身竞争力。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出海企业在海外人才战略上普遍面临着一些挑战。

对此,领英中国人才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王茜认为,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缺乏海外人才战略整体规划,过于追求速度和短期效应,没有对人才梯队建设的长期积累;第二,对于海外人才眼中“好雇主”的理解有偏差,在如何吸引海外人才,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方面有待提升;第三,在与当地文化融合上的水土不服,对于如何让公司的制度适配海外不同地区的做法与文化,还有待长期的有效探索。

“只有将质量、速度和成本这三者平衡好,才能使得好的海外人才招得进、留得住,真正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价值。”王茜说,从更高的维度来看,一家出海企业只有从战略视角看海外人才发展问题,才能真正发挥他们在推动企业战略实现

中的作用。

中国企业出海的大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从早期性价比高的加工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模式出海,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需要在海外塑造品牌影响力。

领英中国营销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蔡晓丹表示,受疫情影响,B2B企业对于数字化营销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加强烈,对出海营销的理解和认知也更加成熟,希望借助在线社交媒体,推动国际市场的拓展。

“国内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营销遇到更多的是内容生产相关的问题,而对大公司来说,如何实现不同系统和平台的数据互联互通,形成从前端、中端、后端到销售这样一个完整的数字化跟踪体系更为关键。”蔡晓丹认为,不同企业开展数字化营销的难点也是不同的。她提出的建议是:聚焦整个数字基建的打造,这是数字化营销的基础,用一整套数字化的手段持续监测、收集和整合,实现完整的营销闭环;区分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避免过于单一短平快的打法;深入了解不同国家与地区市场的用户,洞察

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带来的内容偏好等;对齐企业市场部门和销售部门的目标,实现有效联动。

“市场和销售团队之间一定要在前期制定好共同的目标,将营销的衡量标准设定好,以便能够清晰地衡量大家的工作表现。当市场团队进行推广之后,销售团队需要更好地跟进配合,这才是一个良性的联动。”蔡晓丹进一步说道。

王茜也对出海企业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企业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摒弃投机的心态,做时间的朋友,实实在在地为海外客户提供长期稳定的核心价值;二是企业出海一定要调整本土化的心态,做更多的计划,做更科学有效的执行,制定更科学有效的战略规划;三是企业一定要思考如何能够在海外市场建立长期信任关系,消除由于对企业本身品牌认识不足造成的对企业产品、技术表面上的歧视。

两位负责人还表示,未来,领英希望在中国企业出海“走进来”阶段,更大程度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更多中国企业提升国际视野和本土化运营能力,实现真正的全球化。

投资环境

尼日利亚2021年吸引外资流量翻番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日发布的《202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达到1.6万亿美元。非洲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达830亿美元,同比增长113%。西非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40亿美元,同比增加48%,其中尼日利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达到48.5亿美元,同比翻了一番,占到西非地区的三分之一强。2021年尼继续稳居非洲GDP总量第一大国,吸引外资数量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石油投资的复苏和天然气产业的扩张。

乌克兰预计需7500亿美元进行重建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7月4日报道,俄乌冲突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造成大规模毁坏,乌克兰预计需要7500亿美元来完成三个阶段的重建计划。报道援引路透社消息称,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在瑞士主办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上表示,乌克兰基础设施的直接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重建计划估计需要7500亿美元。他还表示,乌克兰的重建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重建对人们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如饮用水供应;第二阶段是战斗结束后立即启动的“快速重建”计划,包括搭建临时住房、医院和学校;第三阶段旨在对国家进行长期改造。(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